

重新定義「崇拜」

對於中共領導層來說，1958年上半年是一段不停奔波與連續參加會議的時期。毛在這一時期的講話中反覆地回到教條主義主題。他廣泛地強調必須克服對蘇聯模式和「專家」的盲目崇拜。在這段時期內，不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對於經濟發展應極為關注開發重工業的理解，政策的重點轉向了農業集體化。憑藉發起「大躍進」，中國似乎便能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這一口號（「大躍進」中最顯著的口號）的指導下跨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時期。破除迷信是要在培養「真理」崇拜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完成，而毛澤東思想則被認為是最接近於真理的思想。正如本章所示，在「大躍進」時期，毛在領袖崇拜和思想解放之間巧妙地設定了一種辯證關係，¹這與最初自延安時期以來在公眾範圍內引發其個人崇拜是有所不同的。

67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省會成都召開會議。在一系列的講話中，毛通過援引諸多先賢（例如從耶穌、佛祖到馬克思和達爾文這樣的宗教領袖、科學家和哲學家）強調了自發獲取真理相較於努力積累知識的優先性。根據毛的論述，他們全都在年輕之時各自做出開創性的發現，並沒有受過長期教育的影響。進而，一旦發現了真理，他們便會不懈地堅持着他們自己的見解。毛澤東將這一堅持不懈的品質與中共過去的發展進行類比。中國革命成功地抵制了斯大林的建議，並被斯大林斥為假革命。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蘇聯的援助是必要

68

的，但也同時帶來並滋生了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僵化了創造力和比較思維能力。在破除了對外國模式的迷信後，毛聲稱未來值得崇拜的對象只有一個：真理本身。

毛回到「商品二重性」這一主題，他批評了教條主義崇拜的影響：「戲台上的英雄豪傑出來，與眾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樣的人。中國當奴隸當慣了，似乎還要繼續當下去。中國藝術家畫我和斯大林的像，總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從於蘇聯的精神壓力。」²雖然毛堅持認為斯大林在估計中國革命過程時犯有嚴重的錯誤而應受到指責，但是他也厭惡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因為他認為這樣的批判是片面的，並且沒有對斯大林的正確與錯誤做出區分。斯大林的許多思想是「相對正確或基本正確的」³，因此對他個人的崇拜不應當被定罪。「他們不掛〔斯大林的〕像，我們掛。」⁴畢竟，崇拜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於崇拜個人，而是在於崇拜具體的真理。毛因而再次通過其「商品二重性」的觀點提出了他對個人崇拜的看法：

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為什麼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成。⁵

毛對正確的和不正確的個人崇拜的區分使得黨的歷史學家疑惑，即一個如此老練的辯證法家怎麼可能提出如此粗糙的理論？⁶然而，除了毛混亂的論證以外，這份報告的內容還包括另一個有關個人崇拜的效用，它直接揭示了毛論證的政治基礎：毛將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定義為主要服務於政治目的。赫魯曉夫因而將個人崇拜作為超出官僚體系（它並不依賴於黨內精英的認可）權力來源而含有的政治能量加以理解。

但是，就像毛後來告訴斯諾的那樣，赫魯曉夫從未真正成功培養過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因此就被他的政治局同志們輕易地清除掉了。在成都，毛進一步揭露了前中共領導人兼「東北王」高崗試圖培植個人崇拜而引發了八級政治地震。按照毛所說，高崗仗仗其在東北時期的權力基礎培養並建立了其與斯大林的親密關係，對中國政治穩定造成了威脅。無產階級專政因此必須牢牢地掌握在那些代表真理的人手中。毛還引述列寧的話來為自己的正確地位辯護：「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很乾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⁷因而，毛的講話發出警告，不要以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為託辭，通過泛泛批判個人崇拜來挑戰毛的權威：「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⁸

毛對個人崇拜概念的運用是多層面的。在理論上，他願意承認封建殘餘的存在，也承認中共統治與皇帝統治的明顯相似之處；「秘密報告」所造成的影響為毛所謂的打碎崇高象徵會帶來危險的論點提供了有力例證。由於個人崇拜在煽動大眾支持和狂熱上具有情感上的便利條件，因此它便成為了毛在黨的正規官僚渠道之外，強有力地聯繫群眾並實現他自己政治指示的重要工具。進而，個人崇拜在以往不止一次地在黨內的鷸蚌相爭中證明了其本身工具性上的重要意義，因此不可能被輕易消除。

70

大躍進

隨着模仿蘇聯經驗的發展政策被拋棄，公認的發展模式就不復存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除了提供一般原則的模糊知識外，對於怎樣繼續達到未來共產主義沒有什麼明確指示。中共試圖建立一種長期存在的試錯體系，並借助由大眾媒體宣傳成功模式的經驗，來避免在發展道路上困居一隅。但是，群眾路線的經驗則需要被一個總是處於不斷正確領導下

的先鋒黨來加以仔細分析與甄別。毫無疑問，毛認為他本人作為中國革命的舵手，無疑是中共黨內最能擔當此任的唯一人選。因此，他所號召的對那些坐在辦公室的有職有權者進行激烈的批判（「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在執行時就出現掣肘。毛反覆強調當前發展的正確觀點並不一定自然地產生於類似中央主席那樣級別的中共高層中：

一個人時對時錯，對了我們就跟隨他，錯了我們就不跟隨他。不能不加辨別的接受。我們追隨馬列，我們也在一些事情上追隨斯大林。我們追隨一切掌握真理的人。即使他是個挑糞的或掃大街的，只要他掌握真理，就應當被追隨。¹⁰

通過事後回溯來定義真理要比從日常政治生活中定義簡單得多。毛經常開玩笑說，他自己的認識歷程就是從儒家觀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因此他也承認他本人不免有些錯誤觀點。但是到了1958年，所有來自政治局同志的批評，就如國防部部長彭德懷一年後在廬山會議上在毛的眼皮底下批評大躍進的過度實施那樣，但凡威脅了毛的個人權威，毛一律不再聽取。總之，政治權力問題從根本上就優先於理論自治的問題。

在毛的追隨者當中，「不同種類的個人崇拜」的區別和這種說法本身所含的語義玄機，被毛的追隨者視為是指去世的共產黨先輩或者未來的共產黨領袖，不是在指毛澤東本人。正如早在1956年，毛就提出退居領導第二線，好讓他的接班人能獲得治理黨國的第一手經驗。國家主席和黨主席的地位因此不應完全和毛個人緊密相連。然而，成都會議提出的「正確的個人崇拜」卻掀起了一輪大範圍對毛澤東歌功頌德的熱潮。柯慶施這位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也是大躍進中「以綱為綱」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提出相信毛這位中共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甚至服從毛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¹¹在同一年，康生這位毛在延安時期的前安全部門頭子和1958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宣稱毛澤東思想應當被視為當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幾個月後，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屆二中會議上，一位地方代表發言道：

要徹底破除迷信，做到真正的思想大解放、思想大革命。對毛澤東思想不存在迷信的問題。過去偏重學馬恩列斯原著，而對毛澤東的著作學習得不夠。今後幹部必讀，應以學毛著為主，這是活的辯證法，活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真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¹²

所有有關「迷信」的措辭在語義上都近似於「盲目接受蘇聯模式」。因此，學習毛澤東思想就先驗地與其他任何一種個人迷信劃清了界限。在八屆二中全會會上，來自於毛澤東家鄉的湖南省小組就明確提出了以下「等式」：「我們衷心地跟着毛主席走，並不是崇拜個人、迷信個人，而是崇拜真理。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證明，毛主席就是真理的代表。」¹³

毛反覆要求提高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號召將共產黨人的雜誌分別根據黨內讀者和一般公眾讀者分開發行，以此引發關於上層建築沾染資產階級影響的惡劣後果的思考。甚至在「百花齊放」運動失敗以後，毛仍然試圖探索出一條公開批評基層黨組織官僚主義和腐敗的道路。這似乎需要創造一種氛圍，即一種能讓民眾「敢說敢做」¹⁴的氛圍。正確的個人崇拜就有助於培養這樣一種生動的情感氛圍，而在這一氛圍裏，只要無產階級的立場堅定，任何一個人都能夠勇於「愚公移山」（〈愚公移山〉一文後來成為了文革中的「老三篇」之一）。但是，如果不相信、不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真理，如果不根除舊社會的意識形態殘餘，共產主義就永遠不會實現。因此，在探索的道路上，必須以對共產主義堅定信仰和堅決捍衛的姿態來武裝人民。

由此所導致的結果就是沈邁克教授所特指的「由代理人而來的解放」¹⁵。通過把個人崇拜強大的聚合功能與一個更高的目標（即破除對蘇聯模式的迷信）結合起來——中共領袖將個人崇拜視為獲取更大利益的手段。個人崇拜首先是旨在為中國尋找獨特的共產主義道路，而不是首先成為一種統治的工具。很典型的是，這一階段的個人崇拜也因此可以被描述為卡爾·波普（Karl Popper）所說的「社會烏托邦工程」（utopian social engineering）的嘗試。¹⁶正如毛在其最著名的一首詞中所表達，「一

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精神高漲的中國人民即將破除盲從蘇聯模式的壓抑氣氛，規劃出他們自己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

73 毛所設想並煽起的旨在消除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根源的熱情動力，引起了虛報農業統計數據和文化產品的競賽，以此來標誌省市地方幹部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因此，個人崇拜的建立在大躍進時期得到了大規模的恢復。與此相關的例證分成兩部分：一是描述毛視察模範公社時所使用的神化語言，二是中共中央面臨的防止地方對中央表達「資產階級式」的讚美的困難。早在1957年末，中共中央就不得不嚴格遵守它先前制定的有關禁止以當時領袖的名字命名地方、街道和工廠的規定。¹⁸1959年6月，以河北省政府的名義進行的一項鄉村標語審查工作揭示了大量不正確並需要更正的吹捧標語。¹⁹毛澤東本人在1959年4月的上海會議上嚴厲批評了全國流行的虛假傾向，並在之後表示要警惕「五風」（即平均主義、命令主義、盲目領導、自高自大和傲慢態度）在黨員幹部中的重新出現。他甚至號召把「好人」和「壞人」——即在大躍進第一年期間或是經得起考驗或是誇誇其談的人——的事跡都裝訂成冊。當時的信號明顯是要對大躍進的過度發展進行校正。在人民公社的報告中表明，「浮誇風」應以實事求是來糾正。

在1959年7月召開廬山會議前，劉少奇已經成為國家主席，毛則是權力更大的中共中央主席。從1959年7月廬山會議的危機來看，劉的上任不可能有效地改變以毛為核心的政治機制。1959年7月14日彭德懷在給毛個人的信件中表現了對大躍進的嚴厲批評，這也對之後個人崇拜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這封信件致使毛一反其知錯就改的溫和態度。彭作為解放軍領袖的地位以及有可能使政權失去軍隊的支持所帶來的固有危險，再加上蘇聯國防部部長格奧爾吉·朱可夫 (Georgi Zhukov) 事件背景的威脅，致使毛決定做出激烈的反應。毛指責彭和其他人搞「軍事俱樂部」企圖奪權，剝奪了彭的軍權。這次由毛的怒火點燃的危機，非但沒有使中共糾正大躍進反而復興了大躍進的政策。這些政策的繼續實施最終導致了極度痛苦的饑荒，以致幾千萬中國農民餓死。²⁰

74

鑒於彭曾在軍隊中擁有很高的聲望，毛必須任命一個具有相似地位且忠誠於他的指揮官來取代彭。林彪元帥被視作一個理想的選擇。林彪是解放軍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一位，以其軍事才能和對毛的絕對忠誠而聞名。由於其健康狀況的不穩定，儘管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頭十年一直保持低調，但他仍然在1958年2月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林之所以決心擔任如此重要的職位，主要是因為毛的不斷催促。林彪一上位，就立即根除任何質疑毛權威的苗頭，他所用的手段與延安整風運動時期的軍隊道德建設如出一轍，即對毛澤東著作進行註釋契合和公開擁護。劉少奇在個人崇拜方面與林彪並駕齊驅。1959年9月9日，劉指責一批黨員（例如彭德懷）企圖效仿蘇共「二十大」的例子，欲取毛澤東而代之。正如1943年一樣，劉的支持態度再一次對承認崇拜毛是中共中央的標誌所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劉此時稱自己是堅定的個人崇拜擁護者：

我這個人，歷來是積極的提倡「個人崇拜」的，也可以說「個人崇拜」這個名詞不大妥當，我是說提高毛主席的領導威信。我在很長時期就搞這個事情……現在我還要搞，還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個人崇拜」。你們不贊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²¹

在劉看來，個人崇拜是一個用來描述毛澤東作為黨及中國革命象徵的不確切的名詞。為了黨的利益，建立和培養強大政治形象的力量必須進一步加大。雖然探索共產主義的道路曲折，雖然派別的明爭暗鬥暗藏殺機，但是個人崇拜依然十分重要，這在一些對接班人的小型崇拜中得以證實。在媒體中，由於中共黨的集體領導形象是強有力的、正面的，因而是非常團結一致的，但與此同時宗教意義的暗示或將中共統治類比為帝王統治的行為都是意識形態的遺毒，隨着時間的流逝而被清除。由於彭德懷被廢黜，黨內支持「正確」個人崇拜的人慢慢穩住了陣腳。1960年9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出版，帶來了在媒體上的慶祝與學

習運動。然而，雖然在國內崇拜毛得到充分的確立和理論論證，但是問題在國際層面上卻並未解決。這也是中國與蘇聯關係日益緊張的主要意識形態原因之一。

中蘇關係決裂與論戰

自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之後，中蘇關係日益惡化。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個原因事關政治路線。中共與一些小國的共產黨（包括阿爾巴尼亞、朝鮮、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反對赫魯曉夫同西方國家和平共處的理念，強調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要持續鬥爭。對個人崇拜的質疑加重了中蘇之間的意識形態差別，中共認為質疑個人崇拜削弱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團結。最後，蘇聯對大躍進運動的批評及其1959年秋在中印邊界衝突上堅持中立態度的做法，進一步加深了中蘇兩國間的敵意。第二個原因可能更關乎人的本性與赫魯曉夫本人所扮演的角色。正如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指出的，國際事務的交涉必須以高度的法典化方式進行，以避免交涉失敗導致的惡果。²²但是，赫魯曉夫並不具有外交家的特質，他經常當面以尖銳唐突的評論指責他人。在1959年2月華沙舉行的一次會議中，他在一次私人談話中把毛稱為：「一個反覆無常的老人，就像一隻舊鞋，僅僅適合放在角落裏供着。」²³而在1960年布加勒斯特舉行的一次會議中，他甚至提議為彭德懷立像。只要毛與赫魯曉夫繼續領導各自的黨，中蘇關係的改善就會因為他們兩人間的緊張關係而近乎無望。²⁴

在1960年4月《紅旗》雜誌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一文之後，中蘇關係的裂痕越益明顯。中共借列寧90週年誕辰紀念活動之際抨擊蘇聯沒有堅持掌握列寧主義的重要性，特別是其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理論的重要性。1960年8月，蘇聯撤走援助中國的技術專家，意識形態衝突在布加勒斯特和莫斯科的會議上延續着，直至第二年仍未休戰。在1960年11月的莫斯科會議上，中國代表團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後在此次會議